

## 苏联苏共

#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上）

（1944 - 1947）

沈志华\*\*

**【内容提要】** 二战后期,苏联确定了在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为此在其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出了“联合政府”政策。通过各国共产党实施的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然而好景不长,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本质的不信任,以及各国党自身利益的驱使,造成“联合政府”政策在东西方同时破产,冷战随之兴起。

**【关键词】** 苏联外交 联合政府 冷战起源

**【中图分类号】** K512 ·5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 - 721X(2007)05 - 0071 - (07)

关于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际学术界大体上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受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主导,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侵略性和进攻性,美国的传统学派和新修正学派都持这种看法。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战后苏联国力的衰弱使其对外政策表现出保守性和防御性。笔者对战后苏联外交史的研究结论,总体来说,与后者相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的重大研究课题“苏俄史研究”(05JJJD61W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研究得到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B406)。

\*\*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这方面,除了过去大量的传统学派著作,约翰·加迪斯的一部名著很有代表性。在这部显然是回归传统的书中,作者强调,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从来不会放弃世界革命”,因此,只要斯大林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见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7, pp. 290 - 293, 295。

详见: 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 - 1956)*,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8; V. O. Pe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 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3, 1995; Aleksei M. Filotov, *Problems of Post - 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 - 53*, New York: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1996, pp. 3 - 22;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5 - 276;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 15, 21。

同。不过,如何分析和认定这种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者之间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了。笔者认为,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初,斯大林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合作,并通过建立和维持势力范围来保证苏联的安全,通过与西方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保证苏联的发展。<sup>[1](pp55-66)、2(pp172-187)]</sup>而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斯大林通过对共产党的指挥,在苏联的周边国家及其力量所及的地区,推行了一种“联合政府”政策。

其实,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曾努力推行“联合政府”政策,主张各国通向社会主义应有自己的方式和道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项政策的实施究竟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构想,还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开始实行冷战政策,并彻底放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里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斯大林为了推行冷战而抛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还是因为这项政策的破产导致苏联走上了冷战道路?这是冷战史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判断战后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需要对“联合政府”政策提出及实施的过程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

### “联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1942年1月,与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sup>[3](p154)]</sup>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1、搜集和整理世界各国的现行协定及有关政府、政党、侨民团体和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的资料;2、根据上述资料研究并整理边界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民族问题,首先是涉及欧洲大陆,特别是涉及与苏联相邻国家的此类问题,国家间组成的联邦、集团和联盟的各种设想,重新分配殖民地、委任统治地和势力范围的方案,建立新的全欧或全世界国际组织的各种方案。与此相联系,还应研究和整理有关建立国际武装力量的各种方案、削减和限制武装的各种设想以及在这方面实施国际监督的形式;3、研究和整理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战后经济安排的设想;4、研究和整理对于有争议的、在此次战争结束时必须加以解决的领土、民族和其他问题。最后,写出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综合报告。<sup>[4](pp665-667,pp668-671)、[5](pp15-16)]</sup>1943年9月又决定,在外交部属下分别成立以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为主席的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以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为主席的停战问题委员会。<sup>[4](pp672-673)]</sup>

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指出,战后苏联外交的目标是“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为此,就必须保持同西方伙伴,首先是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的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如果战后初期在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么苏联与美英的关系“必然会紧张起来”。<sup>[4](pp684-713)]</sup>作为一个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著称的“莫洛托夫派”的年轻外交官,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的看法更具代表性。在7月14日《关于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中,葛罗米柯在列举了未来苏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后,很严肃地总结说,“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但苏美“两国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也清楚地摆在眼前。在很大程度上,将来的关系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它早已成形,或在战争期间正在成形”。<sup>[6](p8)]</sup>11月15日,李维诺夫委员会又提交了一份有关《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可能性的基础》的备忘录。同迈斯基的想法一样,李维诺夫认为,英美的对抗是战后世界的基本特点并将因此为苏美合作提供好的机会。同时,对于必然出现的苏英在欧洲的利益冲突,可能会“迫使英国和我们达成一种协议,而双方只有根据相对接近的原则严格地划分出欧洲安全范围的界线,才能在这一基础上达成协议”。<sup>[7](p90)、[8](p19)]</sup>

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世界革命,而只有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为此苏联必须与西

该报告还认为,在战后不久的将来,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这个见解对日后的苏联对华政策不无影响。

方合作。正如俄国学者佩恰特诺夫所言,这三位苏联外交官“都希望一种真正的战时联盟的延续——的确,他们认为这是战后苏联维护其利益的先决条件”。他们都认为,美国、英国和苏联可以将世界划分成一些不同的势力范围,而苏联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从传统的地缘政治上来考虑的”,并不是那个“很难被西方盟国所接受的苏维埃化模式”。<sup>[6](pp16-18)</sup>

这些建议和报告,或者迎合了斯大林的意愿,或者为斯大林所接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苏联军队准备大举反攻向欧洲推进之际,1943年5月,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提出立即解散共产国际,目的就是要排除苏联与西方合作的这个“障碍”,“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sup>[9](p372,pp374-375,pp377-378),[10](p6,p21)[11]</sup> 那年秋天,斯大林甚至作出了改换苏联国歌的决定。人们早已经熟悉的《国际歌》不再是国歌而只能作为党歌了。斯大林亲自挑选和修改的歌词,突出了“伟大的罗斯”。<sup>[12](p274)</sup> 这些无疑说明,在表现出一种与西方合作的强烈愿望的同时,战后的斯大林更加偏离了一个世界革命领袖的形象。

葛罗米柯后来回忆说,1944年9月斯大林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橡树园会议期间,给他下达过明确的指示:苏联赞同把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而不是欧洲,目的就是促使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时给葛罗米柯的强烈感觉是,“斯大林确实实期望在战后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长期的合作”。此外,从与斯大林的多次会谈中,英国外务大臣艾登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得出了同样的印象。<sup>[13](p18),[14](pp275-276,pp279-280)</sup> 1945年1月28日,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被划分成了敌对的两块——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而对于苏联来说,最危险的国家是德国。“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由于腐朽和两个敌对阵营的相互削弱,这有助于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我们必须放弃只能通过苏联制度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观念。它也可以体现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例如民主制和议会共和制,甚至君主立宪制。”负责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则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战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莫斯科必须减缓在国外宣传和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上述情况说明,斯大林在战争后期集中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继续维持和巩固与西方的同盟关系,其目的不仅是要尽快消灭法西斯,也不仅是考虑到战后苏联国力衰落的现实,而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避免再次使苏联陷入战争的泥沼,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的指导下,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联合政府”的政策,即在那些将要打败和已经打败法西斯的国家应该建立起民主制度,共产党必须与其他各党派实现联合,共同组建政府。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这一政策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

## “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战争期间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欧洲8个小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

---

CDA(保加利亚国家档案中心),Find 147 B,op.2,ae.1025,1.1-6,该文件复印自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收藏的英译本保加利亚档案,下同。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77,.3,.174,.3,转引自 . . ( . . )  
:  
;“ ”,1944  
-1948, : ,2002,.94。

当然,莫斯科并非否定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在1944年1月17日苏联情报局的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耶夫认为,目前宣传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是“以各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宣传苏联的制度”,但强调这种宣传要避免“公开”和“直接”的形式,而应该“朴实”地进行。 . .88,.1,.998,.1-2,转引自 ( . . ) , .94。

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的公开讲话中说:“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其目的之一就是“新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是永久不发生,至少也要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98-399页。

利、芬兰、比利时),共产党员总数由战前的 10 万多人增至战后初期的 70 万人。甚至连历来很小的英国党,其党员人数也从 1939 年的 1.8 万人扩展到 1944 年的 5 万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 1946 年法共已发展到近 100 万人,意共则达到 200 万人。<sup>[15] (p3, p146)</sup> 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 71 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 年 2 月 1 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 50 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 25 万人。到 6 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sup>[16] (p105)</sup> 1943 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 1944 年 6 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 40 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的游击队”也有 25 万之众。民族解放委员会还在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初步实行了各项民主改革措施。<sup>[16] (pp324 - 325)</sup> 在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发展到 72500 人,并已成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

1944 年 10 月 23 日,苏联与英、美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法国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 26 % 的选票,社会党与其附属党派获得了 25 % 的选票。<sup>[17] (p402)</sup> 11 月 19 日,长期侨居国外的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谈到党的任务时,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sup>[4] (pp727 - 737)</sup> 回到巴黎后,多列士提出了“团结、战斗、劳动”的口号,并以法共中央的名义“一再重申:‘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在多列士的指使下,法共随即下令内地军服从政府命令,分散编入法国陆军。同时,许多领导解放委员会的法共党员,则把权力交给了戴高乐委派的地方官员。<sup>[16] (pp313 - 315)</sup>

1943 年底到 1944 年初,莫斯科对意大利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但 3 月 3 - 4 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时,确定了同法国一样的合作方针。为争取国内反法西斯民主主义改革更加深入,意共领导人曾要求维克多 - 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彼·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斯大林在谈话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1)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2)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3)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sup>[8] (pp19 - 20), [9] (pp410 - 411)</sup> 陶里亚蒂离开莫斯科后,3 月 14 日,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里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里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陶里亚蒂还一再向盟国咨询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墨菲表示,“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法西斯主义,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sup>[16] (pp326 - 328)</sup> 正因为如此,在 10 月 9 日苏英领导人会谈中,当丘吉尔表示担心盟国军队撤离意大利后意共会发动内战时,斯大林一方面表示不反对英国在意大利的政策,一方面轻松地保证说,“埃尔科利(埃尔科利是陶里亚蒂流亡时的曾用名——作者注)是聪明人,他不会去冒险的”。<sup>[18] (pp51 - 52)</sup>

1944 年 5 月苏英达成协议,为了报答英国对苏联在罗马尼亚政策的认可,作为交换,莫斯科决定不插手希腊事务。应艾登的要求,7 月 26 日莫洛托夫派代表到希腊解放区,劝说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流亡

---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第二卷,第 3 页。关于战时希腊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情况,详见 David H. Close ed., *The Greek Civil War, 1943 - 1950*, *Studies of Polar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97 - 155; R. Craig Nation, *A 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44 - 8*,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 125 - 143.

Silvio Pons, “Stalin, Togliatti,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53”, Yale University, 23 - 26 September 1999, pp. 1 - 3.

在开罗的帕潘德里欧政府。9月初,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自行宣布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区已经掌握的政权。9月22日英国政府通知莫斯科,准备近期向希腊派遣军队,以帮助希腊政府。第二天维辛斯基回信说,苏联将继续遵守五月协议,不反对英国向希腊派兵,自己也不打算派遣武装部队到那里。9月26日,就在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希腊人民解放军和民主联盟领导人与希腊流亡政府代表在英国的策划下签订了卡塞塔协定,按照协定,“所有在希腊活动的游击队一律服从希腊民族团结政府的命令”,而“希腊政府把这些部队交由盟军最高司令所任命的斯科比将军指挥”。<sup>[19](p622)、[16](pp247-248)]</sup>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0月与丘吉尔炮制的那个划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著名“百分比协议”,对于希腊而言,不过是确认了既成事实而已。

在北欧几个国家,情况也大体相同。比利时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远远不能与法共和意共相比,但到战争结束时,通过抵抗运动,也控制着10万名武装人员,而当时国内的警察只有1万人左右。由于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影响,经过改组的皮埃洛临时政府在比利时历史上第一次吸收了两名共产党员入阁。当1944年10月政府宣布将抵抗运动武装力量有条件地纳入正规军时,尽管比共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同意见,甚至以退出内阁相威胁,但在盟军驻比部队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交出了全部武装。因此,在1945年2月组成的以社会党人范阿克为首的“全国团结”政府中,共产党继续保留了两名阁员的位置。在战后的选举和政府组成中,荷兰、丹麦、挪威共产党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其原因主要不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拥有相对强大的实力,而是执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态。<sup>[16](pp881-882,pp884-886,p891,p920,p933,pp951-952)]</sup>

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欧洲国家不同,这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亚洲大国。在战争期间,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被认为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为实现在远东的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核心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在1945年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sup>[20](pp338-340)、[21](pp37-40)]</sup>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并不了解,尽管早在6月份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

---

参见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368页;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二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4、245-248页。对于莫洛托夫派遣的波波夫小组的任务,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见

“ ” // ,

: ,1998, .8-9。  
 , .3, .64, .99a, .40,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6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第251页。

有关“百分比协议”的俄国档案已经全部解密,这包括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1953年6月3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 ,2003, 2, .45-56),1944年10月10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10月17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 : , , (1941-1945), : ,2004, .429-438,476-480)。以上档案的中译文参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61-278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21-726页。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sup>[21](pp68-71)、[22](pp391-393)</sup> 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毛泽东本来以为此乃中共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要求所属部队在日本投降之际,迅速占领所有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市长人选名单。<sup>[23](pp215、pp213-214)</sup> 11日,延安总部又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sup>[24](p613)</sup>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却心如火燎,作为缓兵之计,他接连两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全然不睬,一面命令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山西各大中城市,一面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方针,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条件也“照此办理”。<sup>[25](pp8-9)</sup>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中国半壁河山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无论国共冲突的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中共盼望的“国际援助”没有出现,却等来了一道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把兵力集中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革命”转向和谈。<sup>[23](pp243-244)、[25](p9)</sup> 8月25日,毛泽东决定亲自赴渝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sup>[24](pp615-616)、[26](pp1-3,pp15-17)</sup>

## 参考文献

- [1] 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页;
- [2] 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页。
- [3]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册,叶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54页。
- [4]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 [5] . . . , . . . , . . . : , 2001.
- [6] Pe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
- [7]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06, .6, .14, .143, .31-89, 转引自 . . . : . . . , 1939-1947// . . . , 2005, 1.
- [8] . . . , 1944-1947 . // . . . , 1996, 1.
- [9] . . . (9 1933  $\frac{3}{6}$  1949), . . . : . . . “ . . . ”, 1997.
- [10] . . . , 1947-1956 . . . : . . . , 1994.

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6页)。据胡乔木回忆,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22日或23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401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月18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 . . . , .493)。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615页)注明为“22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19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20日如故,21日开始改变,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20-21日之间。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08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 [11] . , . 1943 // , 1994 , 5.
- [12] 罗伊·麦德维杰夫、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王桂香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 [13] . . : , : . 1995.
- [14] 艾·哈里曼、伊·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 - 1946)》,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北京:三联书店。
- [15] 费南德·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方光明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16] 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一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 [17] 塞顿·华特生:《从列宁到马林可夫》,邵国律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版。
- [18] . . // , 2003 , 2.
- [19] 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 - 1946):欧洲的重塑》下册,劳景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 [2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 7, Washington: GPO, 1969.
- [21] , . 0100 , . 33 , . 14 , . 244 , . 120 - 125 , . . , . . ( . ) - , 1937 - 1945 . , 2 , : , 2000.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2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 - 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 1949年)》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责任编辑 李敏焘)